



Comments on
Chats in the Imperial Academy

玉堂闲话评注

蒲向明◎著



中国
社会
出版
社



Comments on
Chats in the Imperial Academy

玉堂闲话评注

蒲向明◎著



中国
社会
出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玉堂闲话评注/蒲向明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出版社, 2007. 5

ISBN 978-7-5087-1710-4

I. 玉... II. 蒲... III. ①玉堂闲话—文学评论②玉堂闲话—注释 IV. I207.4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63506 号

书 名: 玉堂闲话评注
著 者: 蒲向明
责任编辑: 彭先芬

出版发行: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: 100032
通联方法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
电话: (010)66051698 电传: (010)66051713
邮购部: (010)66060275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开 本: 170mm×240mm 1/16
印 张: 26.5
字 数: 450 千字
版 次: 2007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: 38.00 元

(凡中国社会出版社图书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序 一

侯忠义

在我国的小说史上,唐代是小说的成熟期。鲁迅先生说:“小说亦如诗,至唐代而一变。”(《中国小说史略》)这里所说的“小说”,当指我们今天所称的“传奇小说”。唐代小说除传奇小说外,尚有笔记体的志怪、轶事小说和早期的白话小说,由这三种体裁小说组成了一个唐代小说完整的体系。唐代小说取得了杰出的成就,留下了众多传世之作和精彩华章。而这个成就,也包括五代在内。

五代短短的五十余年,是唐末的延续,从小说创作来说,更是如此。如传奇小说集皇甫枚《三水小牍》、杜光庭《虬髯客传》,就是优秀的传奇小说;而王仁裕的记开元、天宝遗事的《开元天宝遗事》,及记唐末五代世态人事的《玉堂闲话》,就是优秀的轶事小说集。

王仁裕是五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文言小说作家。《新五代史·王仁裕传》曰王仁裕:“字德辇,天水人也。”五代时,“以文辞知名秦、陇间”。曾有《西江集》,诗至于万首。他同时是一个政治家,历仕唐末及前蜀、后唐、晋、汉,官至兵部尚书、太子少保。这种经历,也影响了他小说的内容和特色。王仁裕一生留给历史的最有价值的东西,不是他的政绩,而是两部小说集《开元天宝遗事》和《玉堂闲话》。《开元天宝遗事》今有传本,而《玉堂闲话》却于宋元间亡佚,佚文主要保存在宋初编辑的《太平广记》中。

《玉堂闲话》成书于五代晋、汉年间,主要记录了晚唐五代时期的人情世态与社会动荡的现实。其中包括帝王将相、凡夫走卒、文人僧道、富翁村妇各色人等,构成了色彩斑斓的形象图画。《颜真卿》、《裴度》、《葛周》、《刘崇龟》、《邹仆妻》、《刘钥匙》、《灌园婴女》等篇,都是情节曲折、艺术性强的好作品。书中既不乏秦、陇的山川风物,亦多仙道怪异,宿命报应。

然而,就是这样一部优秀的轶事小说集,长期却没有一个理想的读本,无论读者或研究者均引以为憾。现在陇南师专的青年学者蒲向明君穷十年之功,在搜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,编撰了这部《玉堂闲话评注》,了却了他对故土作家的一个美好的心愿,令人高兴。

《玉堂闲话评注》是一部高质量、高水平的古籍整理著作,也是一部难得的

序

王仁裕
闲话评注

学术研究著作。作者以新视野、新角度、新材料,在把握作品的背景和内涵的基础上,通过辑佚、校订、注疏、评记四个环节,编撰了这部创新的著作,填补了小说史研究的空白,也给广大读者提供了一部可鉴赏和品评的小说读本,十分可贵。

《玉堂闲话评注》是目前最完整、最可信的辑佚本。蒲辑本分六辑一百八十六条,是辑本中收录佚文最多的。作者从《太平广记》、《绀珠集》、《唐诗纪事》、《说郛》、《永乐大典》等各种丛书、总集、笔记中,广搜佚文,并吸收了今人研究成果,对佚文详加考证和鉴别,成为最可靠、最可信的本子。

校订,即对原文加以校勘、订正。书中正文,作者用各种版本如明抄本、明谈恺刻本、汪绍楹校本、陈尚君辑本等,以及本人的研究成果,对文中的官职、年代、人物姓名均有所订正和纠谬,颇有学术价值。对异文,未改者,有校勘说明;已改者,有版本依据,态度是严肃的,科学的。

注释不局限在一词一句。对官职、地名、人物(名)的注释,官职讲古今渊源,地理讲历史沿革,人物讲贡献价值,都有厚重的内容。注释并征引了大量原始文献、图书资料,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。“疏”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,做到了对“注”的进一步阐释。如《玄宗圣容》“夹纈”注,不仅指出它是塑像的一种方法,而且用言简意赅的语言,对这种方法做了精确介绍,颇有启发。

评记既是鉴赏,又是评点;既有客观的知识,又有个人的感悟。涵盖面是广泛的,使读者受益良多。每篇评记能从文字和文意两方面为读者提供资料和信息、个人的见解和体会,每篇评记几乎都是一篇优秀的评论文。

蒲向明君与我并非故交,是《玉堂闲话》使我们相识、相知。他的著作《玉堂闲话评注》,使我对他的勤奋刻苦、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以及渊博学识,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我祝愿他在今后的小说研究中,取得更大的成绩。此为序。

2006年10月

于北京大学



序 二

陈尚君

蒲向明君作《玉堂闲话评注》成，问序于我。我与蒲君不认识，仅因以前我曾作过王仁裕《玉堂闲话》的辑本，曾为蒲君所参考；蒲君老师董乃斌教授又作了推荐，因此见商于我。我自感难以充分表达蒲君工作的意义，但深为其僻居陇南，仍能执著坚持研究乡邦文献的精神所感动，难以推辞他的委托。在此，我想略谈对王仁裕其人其文及其成就的看法，权当书序，以供蒲君和本书的读者参考。

陇南文学，虽然现代学者也依据唐人的郡望所在找到一些作家，但真正生于陇南、葬于陇南者并不多。王仁裕是唐代著名文人中确实生于陇南的大家。从现在可以见到的王仁裕家族资料来看，从其曾祖开始，直到其兄、其子，数代人主要是在关陇一带的军幕和地方担任僚佐和县职，不是显宦之家，甚至没有出现很有造诣的文士。在这个家族中，王仁裕显然是位很特殊的人物。有关他早年略不知书，因梦开腹浣肠，复梦吞西江有文字碎石因而文采焕然传说，录入碑志和正史，可能出于他本人的叙述，也是对其不平凡文才的一个特别的解释。从史籍记载的情况来看，王仁裕平生作诗过万首，并有多部各类著作，如果都留存下来，在文学史上当之无愧地跻身一流大家的行列。但很不幸，这位在平凡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异秉文士，偏偏生活在五代乱世之中，他的一切努力很难超越他所处的时代。

在王仁裕出生的那年，即唐僖宗广明元年（880年），以黄巢为首的反抗军经过数年的血战，辗转南北，终于攻入长安，并因此而揭开了唐末二十多年军阀混战的序幕。王仁裕生长边地，未必亲历许多战事，但当他走出秦陇，就不可避免地卷入是非之中。首先辟召他入幕的“秦帅陇西公继崇”（《王仁裕墓志铭》），是以凤翔为中心的秦王李茂贞的犹子，这是王仁裕仕历的第一个政权。后梁乾化四年（914年）前蜀王建攻取秦陇，李继崇归降，王仁裕因此改仕前蜀。前蜀后主王衍偏爱文学，王仁裕也得到一定信任，他在《王氏闻见录》中曾详细记录了随

序
二

王仁裕评注

王仁裕评注

王仁裕评注



侍文学唱和的情景。后唐同光末年的伐蜀战争,再次改变了他的命运。他随前蜀臣僚入洛,开始了在中朝的仕宦,先后历仕后唐明宗、闵帝、末帝,后晋高祖、少帝,后汉高祖、隐帝以及后周太祖、世宗九帝。这种历仕数朝而依然显达的情况,在宋人看来就很有失节的嫌疑,王仁裕的经历丝毫不比被骂为无耻之尤的冯道逊色。但只要深入了解五代历史,就不难发现虽然在乱世之中,王朝和帝位根据军事的胜败和对于禁军的控制情况不断发生更迭,而朝廷的文官政权却是基本稳定,一般不会因为王朝的变化而发生剧烈的变动,因此而形成了大臣迎来送往、安之若素的特殊情况。其实,王仁裕和冯道一样,都是希望有所作为、有原则之人,只要看王仁裕在京兆王思同幕府中以忠义相期许的慷慨,就知道他并非苟且畏死之人。他能够历经磨难而不死,数经变乱而得至显宦,得享遐寿,不能不说是幸而生处乱世的大幸之人。王仁裕晚年,虽然在政治上并没有突出的建树,但在汉隐帝乾祐元年(948年)知贡举时,选择王溥、李昉、窦侃、许仲宣等及第,为五代一榜得人最盛者。其中王溥,后周、宋初时为相;李昉,宋太宗时为相,并主持了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太平广记》、《文苑英华》等书的编纂。可以说,王仁裕为宋初的文化建设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。李昉曾与其子李宗谔谈到王仁裕晚年的生活和文采风流:

先公尝言:恩门王公,终于太子少保。七十后,精力犹不衰。每天气和暖,必乘小辇,从三四老苍头,携照袋(照袋,以皮为之,四方有盖,其中可容一斗),中贮笔砚、《韵略》、刀子、砺石、笺纸数十幅,并小乐器之属。后别置游春盛随事,备酒炙三五人之具,门生在京者多侍行。每出郊野,遇有园亭及竹树之处,必赏燕终日,赋诗,品小管色,尽欢醉而归。吾忝左拾遗日,适暮春,与同门生五六人,从公登繁台佛舍。繁台,即梁孝王吹台也。公是日饮酒赋诗,甚欢,抵夜方散。尝记得公诗曰:“柳阴如露絮成堆,又引门生上吹台。淑气即随风雨去,芳罇宜命管弦催。谩夸列鼎鸣钟贵,宁免朝乌夜兔推。烂醉也须诗一首,不能空放马头回。”其天才纵逸,风韵闲适,皆此类也。(《宋朝事实类苑》卷三十九,未注所出,殆据李宗谔《先公谈录》)

近年甘肃礼县出土王仁裕墓志(蒲君见示)和《陇右金石录》所存神道碑,都出于李昉手笔。李昉虽曾两度入相,但对于王仁裕当年的援引之恩,始终没有忘怀。

王仁裕平生著作,据李昉《故太子少师王公神道碑》(据《陇右金石录》,并参拓本)所载,有《秦亭编》、《锦江集》、《入洛记》、《归山集》、《南行记》、《东南行》、《紫泥集》、《华夷百题》、《西江集》共六百八十五卷,又撰《周易说卦验》、《转轮回

纹金鉴铭》等,已经是很可观的规模。如果放在唐、宋治平时期,也不逊色于任何一个大家。我认为,《秦亭编》以下的九集,基本上都是其个人诗文集。按其生平经历,《秦亭编》为依秦州李继崇期间所作;《锦江集》为仕前蜀时作;《入洛记》为蜀亡入洛后作;《归山集》为明宗时授雄武军节度判官、罢职归汉阳别墅作,《神道碑》称凡五百首;《南行记》、《东南行》应为其出使荆南、吴越期间所作;《紫泥集》,《宋史·艺文志》作十二卷,为其任翰林学士期间作;《华夷百题》可能作于后晋、汉初与辽战事频仍之际,《玉堂闲话》佚文中所存《耶孤儿》歌行,可能为其一;《西江集》,《册府元龟》卷八四一云“有诗万余首,勒成一百卷,目之曰《西江集》,盖以尝梦西江文石,遂以为名焉”,可能是晚年编成的个人定集,也可能是其晚年作品。《崇文总目》卷五另有《乘轺集》五卷,《宋史·艺文志》复有《紫阁集》五卷、《紫泥后集》四十卷,也是晋、汉以来的作品。这些集子总数超过六百八十五卷,实在太丰富了。应该知道唐代李杜韩柳的文集只有几十卷,白居易达到七十五卷,元稹据说有一百卷,而宋代的一批大全集,也很少超过二百卷。王仁裕著作之丰,在唐宋之际十分罕见。

可惜王仁裕毕竟生活在过渡时期的五代,没有见到宋以后的文化发达,他的作品也没有得到广泛的流布,所有的文集都失传了,这是他的悲剧。《全唐诗》卷七三六收王仁裕诗一卷,其中大多出自王仁裕自著《玉堂闲话》和《王氏见闻录》的称引,少数来自宋初《先公谈录》、《广卓异记》、《天下大定录》等书的引录;拙辑《全唐诗补编》补诗二首,题“杜光寺”的一首录自《类编长安志》,可以确定是长兴末在长安所作;《戮后主出降》是宋代流传很广的诗,我根据《豪异秘纂》确定是王仁裕作。《全唐文》没有收王仁裕的文章,拙辑《全唐文补编》也仅录一篇。我罗列这些情况,是希望说明王仁裕诗文集虽然极其丰富,但其今存的所有诗文,几乎全部来源于笔记地志,没有来源于其文集的记录。宋人虽然在书志中曾著录他的文集,其实并不流行,仅在若存若亡之间。

王仁裕存世著作,只有一种,即《开元天宝遗事》,是记录唐玄宗时期逸事的重要著作,但因所记不尽为史实,前人或疑为伪书,对此,《四库提要》已有所澄清。该书在中国的传本,没有序与后记。日本所存宽永十六年(1639年)刊本,卷首有王仁裕自序,为中国传本所无,录如下:

仁裕破蜀之年,入见于明天子,假途秦地,振辔镐都,有唐之遗风,明皇之故迹,尽举目而可观也。因得询求事实,采摭民言,开元天宝之中,影响如数百余件,去凡削鄙,集异编奇,总成一卷,凡一百五十九条,皆前书之所不载也,目之曰“开元天宝遗事”。虽不助于风教,亦可资于谈柄,通识之士,谅无诟焉。

未有绍定戊子(1228年)陆子适(当即陆游之子陆子遯)题记,可信出于宋刊本。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卷九云:“蜀亡,仁裕至镐京,采摭民言,得开元天宝遗事一百五十九条。”即节引此序,可证此序不伪。王仁裕在开元天宝后近二百年于民间采访事实,不怪乎出入较多。今人罗宁以此书与《云仙散录》、《清异录》等书并称为“伪典小说”,即为诗文写作的需要而编造故实、虚构史事的小说,是一个有趣的命题,在此不作深论。(罗说见《论五代宋初的“伪典小说”》,刊《中国中古文学研究》,学苑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)

最后应该说到《玉堂闲话》一书和蒲君的辑读。《玉堂闲话》在宋代流传颇广,其作者虽然另有范质的记载,肯定属于误传,此书为王仁裕作,可以论定。《太平广记》引用此书及王仁裕另一部著作《王氏闻见记》较多,显然因为主持者李昉对于其师著作的偏爱。《玉堂闲话》记录唐末五代时期的史事和社会传说极其丰富,且大多为王仁裕亲身经历及得自当事人叙述的记录,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。对此,蒲君已有较多说明,我就不举例了。我在十多年前,很有志于做唐代文言笔记小说的辑佚工作,积累过一些资料,但因为个人兴趣太多,此一设想始终没有完成。近年《全宋笔记》和《全唐五代笔记》已经先后成编,我的工作大约今后也不准备再做了。最近七八年间,仅因为傅璇琮先生参编或主编《中华野史》和《五代史书集成》的工作,见托于我,一次做了一些很粗糙的辑本,总数约有五六十种之多,《玉堂闲话》是其中一种。承蒲君不弃,本书成书过程中曾较多地参酌过拙辑本,细节方面有一些修订,且补录了我失收的李季兰一则。对拙辑的纠订,有的是拙辑未精密处,有的是见解不同所致。比如颜真卿一条,我按照《太平广记》依据数书拼合成篇的惯例,仅将《类说》中确属于《玉堂闲话》的文字录出;而蒲君则以为此则主要为王仁裕撰,因而全篇收入,当然也可以。蒲君的工作重心是校订、注疏和评记三个部分。由于近期比较忙,我难以通读全书并仔细地加以复核,但就初步翻阅的感觉,蒲君是很认真地做此一工作的。其校订部分,比拙辑显然更为慎重,也参校了一些我没有充分利用的文本。注疏部分,较有特色的部分是对该书涉及关陇一带地理和风俗的解说。评记部分,也是有特色的个人所得。我想特别提到的是,《玉堂闲话》多数佚文来源于《太平广记》,该书现在通行的汪绍楹校本虽然比以前的谈刻本改正很多,但文本错误仍多。我因作《唐五代诗纪事》,曾在台湾校过艺文印书馆印严一萍《太平广记校勘记》,可以订正汪本甚多。近年张国风教授《太平广记版本研究》作了更细密的研究,且不久有新辑本的出版,相信可以进一步补充者仍多。

我与蒲君至今没有见面,承他来信介绍,出生于甘肃天水,曾先后就读于天

前言

一、缘起

我于1986年至2001年在甘肃省礼县师范从教。那十五年教学生涯中，前十年基本是忙于教学、业务进修和生计，无暇考虑其他。1994年获得西北师大在职文学学士学位并被评聘为讲师以后，我觉得还需要继续充实并提高自己。于是，1995年我报考北师大“高校教师硕士学位进修班”，未果。1996年旋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进修班，以同等学力身份申请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硕士学位。我最初的想法是选择元明清文学作为专业方向，因为此前我在《文史知识》、《甘肃社会科学》和几所高校的学报上发表了一些研究关汉卿散曲的论文，其中有的被《新华文摘》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索引，自认为是有点基础的。不巧，研究生院文学系安排导师时，不能使我如愿。后来征得刘世德先生的同意，我在他的指导下以中国古代小说作为专业方向修习学业。

这个变故，在我面前洞开了一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小说天地。虽然我从小就喜欢读家藏的清代或民国的印本小说连环画，诸如《岳飞枪挑小梁王》、《彭公案》、《施公案》之类，或上中学时读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乃至大学时品读《红楼梦》、《金瓶梅》等等，但面对一个中国古代小说世界，我觉得是多么的少知和浅薄。我不禁为自己先前的“自认为是有点基础”感到汗颜。记得当时专业主干课的情况是这样：石昌渝先生讲《中国小说史》，刘世德先生讲《小说版本学》，董乃斌先生讲《中国文学史》，张韧先生讲《文学理论》，周发祥先生讲《美学》。此外，杜书瀛、毛崇杰、袁良骏、杨匡汉等诸位先生给我们这个专业申请硕士学位者还开了专题。我写这本书，是与我的这段学习经历密切相关的。

所以，写这个“缘起”。

1996年春，刘世德先生讲《小说版本学》，课间讨论时，老师听说我是天水人，问我有关古代天水作家的一些情况，特别提到了王仁裕的小说作品，但我对

此几无所知,很是窘迫。回到单位以后,我即着手了解王仁裕及其小说创作的情况。彼时已然仲夏,就算做我钩稽《玉堂闲话》逸文的开始,时断时续,于今年五月基本完成辑读全稿,不觉十年过去了。这期间经历了2001年礼县师范与成县师范合并为陇南师范、2003年在陇南师范基础上改建陇南师专的艰苦创业过程,碌碌于事,不觉时日如驶,转瞬已越不惑,虽内心慨然缕缕,但亦怀疑自己做的这点事:王仁裕不是文学史上地位显赫者,《玉堂闲话》也未入名作之列,费事费力去校、注、译、记这本文言笔记小说是否有学术必要?2003年7月当我致信南京大学周勋初先生请教此事时,先生指出:“要说是(整理《玉堂闲话》)有多高价值,则很难说。反不如先对《开元天宝遗事》作一整理。”果然一语点中我的隐忧。对此,我很是犹豫了一番。内心割舍不去的是我这项工作行至中道,半途而废甚觉可惜。2004年5月首届《西狭颂》学术研讨会期间,我在成州宾馆当面就《玉堂闲话》的辑佚问题请教霍松林先生,先生毫不犹豫地鼓励我说,这个工作很有必要!我于此备受鼓舞,就将这个研究工作坚持了下来。

辑读《玉堂闲话》并非一时兴起,偶然为之。尽管我远非钟爱此书,但它偏偏有几点是我的“心系”所在。其一,新旧《五代史》、《十国春秋》王仁裕本传和《全唐诗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小传等均作其为“天水人”,大体上是不错的。但细究起来,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王仁裕系唐秦州长道县人(今甘肃礼县人),佐证是现存于礼县石桥乡斩龙村其先祖坟塋的北宋碑刻《王仁裕神道碑》和1982年同地出土的北宋刻《王仁裕墓志铭》。我已在《论王仁裕的文学成就》(载《天水行政学院学报》2003年第3期)和《王仁裕生平及文学创作实证研究》(《陇右文化论丛》第2辑,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)两文中论及这一点,此处不赘。需要申明的就是王仁裕籍贯的准确地望,不在今天水境内,而在今甘肃陇南市境内。作为陇南高校的教学科研工作者,就近研究本地作家作品,有着责无旁贷的重任。其二,关于《玉堂闲话》的文学地位问题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,学者对《玉堂闲话》的文学地位日渐看高。顾青《中国小说史》(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)在论及“五代杂事小说集”时认为:“五代时期的杂事小说集以《玉堂闲话》为代表。”程毅中《唐代小说史话》(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)认为,《玉堂闲话》中的作品如《刘崇龟》,“可以说是宋代以后公案小说的先驱,是由唐到宋小说题材扩大的一个迹象”。刘世德《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》(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)认为:《玉堂闲话》“叙事简洁,不乏起伏曲折之笔;刻画人物性格,如见其人、如闻其声,语言平易晓畅,有较高艺术价值”。侯忠义《隋唐五代小说史》(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)更是以不小的篇幅分析《玉堂闲话》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。董乃斌《古代小说鉴赏辞典(上)》(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)

也对《玉堂闲话》颇有赏评。由此看来,辑读《玉堂闲话》还是颇有点与时俱进的学术感觉和显明的必要性。其三,辑读《玉堂闲话》算是我对工作和生活了十五年的、具有丰厚文化积淀的礼县一个学术的交待。礼县置县并不早。据乾隆版《礼县志》:“明宪宗成化九年(1473年),陕西都御史马文升奏请割秦州十九里置县。”历史上有名的西县,故址就在今礼县境内。20世纪90年代中期,在礼县大堡子山发现了秦先祖陵墓,经过李学勤、韩南、戴春阳等学者的研究,本世纪初最终认定礼县为历史上有名的西犬丘的确切地望。礼县留有大量旧石器至清的文化遗存,相关的较大规模考古勘测还在进行中,国家文物局等单位公布的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,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就是其中之一,相信还会有新的或重大的发现。对这样一方土地孕育的作家作品给以研究,认作一种特殊的纪念和心安方式,亦未尝不可,何况王仁裕还是现今陇南地域内最有成就的古代作家。

我引用拙作《王仁裕年谱稿》(见《甘肃高师学报》2005年第4期)的内容来简介《玉堂闲话》的作者:

王仁裕(880~956年),字德辇,史传、别集多作天水人,今据现存“王仁裕神道碑”实物,确定其籍贯应为唐秦州长道县汉阳川(今甘肃礼县石桥镇)人。其经历唐末五代仕宦生涯,晚年颇显赫。仁裕喜为诗,所作诗达万余首,有“诗窖子”之时誉,惜今所见诗作较少。他的诗作虽格致清雅,但乏旷远通达之气,主旨亦显琐屑卑弱。然洞察其轶事小说,遗存颇丰。代表作《开元天宝遗事》、《玉堂闲话》、《王氏见闻录》等,文字简洁,题材广泛,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,受到小说、史学和陇蜀风俗学研究人士的重视与称赞。

再补充一些他当时的任职简况:

王仁裕初为秦州节度判官,后入蜀,为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。前蜀亡,入唐,随王思同为兴元从事、西京留守判官。废帝时,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学士。晋高祖时,历司封、左司郎中、谏议大夫。后汉高祖时,复为翰林学士承旨。累迁户部尚书,罢为兵部尚书、太子少保。后周显德三年卒,赠太子少师。

《玉堂闲话》的作者王仁裕的情况就这样了。当然,疑问还会有,我在《王仁裕生平著作考》(载《甘肃高师学报》2006年第3期)中作了一些探讨,如能得到一些方家指教,正是我所期盼的。

二、《玉堂闲话》研究的进展

关于《玉堂闲话》，专家在著作中所论、所引者甚多。除我在前面提到的著作外，尚有为数不少的文章论及到了这部作品。可是细究起来，专门研究过《玉堂闲话》的，截至目前，大概只有周勋初先生和复旦大学的陈尚君先生。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，周勋初先生就撰有《〈玉堂闲话〉考》一文（《西北师范学院学报》1988 年第 3 期）。这是迄今为止最早、也是唯一能检索到的专门考察《玉堂闲话》的论文，尽管他在给我的信中说，“以前因整理《唐语林》涉及《玉堂闲话》一书，遂有所论述，实对王氏的情况未作全面考量”，但是，我以为那篇文章解决了有关《玉堂闲话》的几个重要问题。

第一，关于“玉堂”指翰林院的确切时间问题。玉堂，在古籍中含义较多，指宫殿、官署、宠妃住所、神仙居处、豪贵宅第、经穴等。玉堂最早指玉饰的殿堂，或为宫殿的美称。宋玉《风赋》：“然后徜徉中庭，北上玉堂，跻于罗帷，经于洞房。”见于宋李昉等《太平御览》所引。至汉则玉堂有三说：一为宫殿名。《三辅黄图·汉宫》：“建章宫南有玉堂……阶陛皆玉为之。”《汉书·李寻传》：“哀帝初，待诏黄门，故云‘食太官，衣御府，久汙玉堂之署。’”颜师古注：“玉堂殿在未央宫。”二为官署名，汉侍中有玉堂署。《太平御览》卷 219 引《汉官仪》：“黄门有画室署、玉堂署，各有长一人。”三为嫔妃的居所，借指宠妃。《汉书·谷永传》：“抑损椒房玉堂之盛宠。”颜师古注：“玉堂，嬖幸之舍也。”从《山海经》、《淮南子》到《神异经》，神仙居处皆称玉堂。唐诗人僧寒山《诗三百三首》云：“玉堂挂珠帘，中有婵娟子。其貌胜神仙，容华若桃李。”玉堂还指豪贵的宅第。如唐卢纶《送绛州郭参军》：“送客今何幸，经宵醉玉堂。”玉堂作为经穴名，指两处。《伤科补要》卷 2：“玉堂，在口内上腭，一名上含，其窍即颧颞也。”《难经·三十一难》：玉堂，亦称“玉英”。于胸正中线，平第三肋隙间。此外，鲜为人知的是在敦煌卷子的写本中，玉堂和麒麟、凤凰、章光作为四吉神，在六甲八卦冢方而用于卜定吉穴，在亡人下葬时还有引道、跃途、启路、回车的作用。（见金身佳《敦煌写本第 2831 页〈卜葬书〉中的麒麟、凤凰、章光、玉堂》，载《敦煌学辑刊》2005 年第 4 期，季羨林主编《敦煌学大辞典》[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8 年版]将该卷文定名为《堪輿书》，为古代阴阳风水著作的一个大类，且历史久远，如东汉郑玄即案《堪輿书》）

玉堂代称翰林院，清人何焯有一说法：“汉时待诏于玉堂殿，唐时则待诏于翰林院。至宋以后翰林遂并蒙玉堂之号耳。”（宋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卷 7 注引）

何焯之说后人大多采信，辞书也多用这一结论。周勋初先生对此做了切合历史的分析，否定了何焯之论，他指出：

这一名词，到了唐代末年时已经用作翰林院的代称，如郑畋曾任翰林学士，著有《玉堂集》五卷；韩偓任翰林学士时，有《雨后月中玉堂闲坐》诗，内云：“夜久忽闻铃索动，玉堂西畔响丁东。”自注：“禁署严密。非本院人，虽有公事，不得遽入。至于内夫人宣事，亦先引铃。每有文书，即内臣立于门外，铃声动，本院小判官出受；受訖，授院使，院使授学士。”凡此均可说明晚唐之时已经普遍运用“玉堂”一词代替翰林学士院。

这个结论我以为是正确的，远较现行的“玉堂是唐宋时翰林学士院代称”这一笼统说法准确清楚得多。不过，所引上文前面周先生称到唐末用玉堂作翰林院的代称，时间断限还是晚了些；后面重申在晚唐之时已经普遍运用“玉堂”一词代替翰林学士院，我觉得是恰当的。但问题是，我们能知道究竟在晚唐的什么时间吗？

在唐有无玉堂殿名，宋时就有不同看法。北宋施青臣《继古藁编》称唐白玉堂如古乐府，非翰苑之玉堂。南宋程大昌《雍录》卷4称唐并无玉堂殿名（参见唐春生《唐宋学士院及翰林学士别称考》，载《重庆师范大学学报》2005年第2期。）而欧阳修《归田录》卷2云：

唐翰林院在禁中，乃人主燕居之所，玉堂、承明、金銮殿皆在其间。应供奉之人自学士已下，群官司隶籍其间者皆称翰林，如今之翰林医官、翰林待诏之类是也，惟翰林茶酒司止称翰林司，盖相承阙文。唐制：自宰相而下，初命皆无宣召之礼，惟学士宣召。盖学士院在禁中，非内臣宣召，无因得入，故院门别设复门，亦以其通禁庭也。又学士院北扉者，以其在玉堂之南，便于应诏。今学士初拜自东华门入，至左承天门下马待诏，院吏自左承天门双引至阁门，此亦用唐故事也。唐宣召学士自东门入者，彼时学士院在西掖，故自翰林院东门赴召，非若今人之东华门也。至如挽铃故事，亦缘其在禁中，虽学士院吏亦止于玉堂门外，则其严密可知。如今学士院在外与诸司无异，亦设铃索，悉皆文具故事而已。

这段文字还见于北宋沈括《梦溪笔谈》卷1和南宋江少虞《皇宋类苑》卷29。它很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些信息：其一，唐翰林院为皇帝“燕居之所”，有玉堂殿且和翰林院同在宫禁。其二，唐朝百官，只对翰林学士有宣召礼，学士院离玉堂殿很近，以便应诏。其三，唐帝挽铃宣召学士入玉堂很为严密，其他官员止于玉堂

门外,即使学士院吏也不能例外。其四,宋时翰林学士院的一些规章沿袭唐制,但严密程度与在外诸司无异。从所处时间和环境较之,程大昌显然是犯了臆断的毛病。遗憾的是欧阳修并未明确时在唐代哪一段。从唐张怀瓘著有《玉堂禁经》的情况看,至少《归田录》所云不会晚于玄宗与肃宗朝,即中唐时期。稍后,唐德宗时所设东翰林院有北厅五间,正厅一间称“玉堂”, (见袁刚《唐代的翰林学士》中华书局 1990 年《文史》第 33 辑)为玉堂实设翰林院之始。北宋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卷 7 引唐元和时李肇“《翰林志》末言:‘居翰苑者,皆谓凌玉清,溯紫霄,其止于登瀛洲哉,亦曰登玉堂焉。’自是遂以‘玉堂’为学士院之称,而不为榜”的说法,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。至于叶梦得所云宋太宗题“玉堂之署”事,只是皇帝赏赐御笔的一个佳话而已。

因此,用玉堂做翰林院的代称,应该在中唐末、晚唐初。

第二,周先生肯定了《玉堂闲话》的作者为王仁裕而非其他人。《崇文总目》卷 2 史部传记类下云:《玉堂闲话》十卷,王仁裕撰(粤雅堂丛书本)。《宋史》卷 206《艺文志》子部小说家类云:《玉堂闲话》三卷,王仁裕撰。据此,周先生说:“《玉堂闲话》的作者为王仁裕,应当是不成问题的。”他对南宋人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误题《玉堂闲话》作者为范质的原因作了分析,还通过对《玉堂闲话》作品叙事主人公的考察证明了该书著者为王仁裕无疑。可是,后人沿用吴曾错讹至今未绝,甚至有的再错范质为范资撰《玉堂闲话》,形成至今《玉堂闲话》作者有三说的局面,这是需要进一步关注的。

范质(911~964 年),字文素,大名宗城(今河北威县)范家营人。历经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、北宋六朝,五朝为官,位至宰辅。据《宋史》卷 249《范质传》:范质自幼聪明好学,9 岁时能作诗文,14 岁始授徒。后唐长兴四年(933 年)中进士,担任忠武节度使推官,后升任封邱令。后晋天福中,以文章为宰相桑维翰深器之,即奏为监察御史。后汉初,加中书舍人、户部侍郎。后周时为兵部侍郎、枢密副使。周广顺初,加拜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,加开府仪同三司,封萧国公。宋初,加兼侍中,罢参知枢密。为太子太傅,封鲁国公。卒年五十四。范质以开进折子先例、废坐论之礼留名于史,著有《五代通录》等。但遍查有关范质的史传或书目,除《能改斋漫录》外,其他各种文献均未有范质作《玉堂闲话》的记载。周先生论证后指出,由于《玉堂闲话》中有许多范质介绍的故事,所以,吴曾误认为此书作者是范质,换言之,南宋吴曾为炮制范质撰《玉堂闲话》这一错讹的始作俑者。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。

范资,新旧《五代史》和《宋史》未传其人,其他史传或书目也未有范资撰《玉堂闲话》的记载。因为五代“范资”本就纯属子虚乌有,为后人以讹传讹、刊刻笔

误的一个产物。“范资”源出范质撰《玉堂闲话》之讹，因“質”、“资”形近而在刊刻或抄录时将范质误刊为“范资”。这个错讹最早起于何时？始作俑者为谁？考之未确，但至少在明代就已经有了。《玉堂闲话》的《葛周》篇（亦见于《太平广记》卷177），被冯梦龙收入《情史》第4卷“情侠类”（文字略有删节），注作“范资《玉堂闲话》”，同时改写作白话短篇小说《葛令公生遣弄珠儿》，编入《古今小说》第六卷。清王仁峻辑《经籍佚文》本，《玉堂闲话》题五代范资撰。由此形成浊流，漫延至今。

令人吃惊的是，在《玉堂闲话》作者“王仁裕说”、“范质说”、“范资说”三者中，“范质说”、“范资说”现今影响还很大。下面是我从互联网上检索到的有关数据。以“王仁裕《玉堂闲话》”、“范质《玉堂闲话》”和“范资《玉堂闲话》”作为词段在“Google 搜索”、“百度搜索”、“中国知网”上搜索的结果如表1（检索日期为2006年5月8日）：

检索词段	Google 搜索	百度搜索	中国知网
王仁裕《玉堂闲话》	531	944	775
范质《玉堂闲话》	111	299	1158
范资《玉堂闲话》	116	97	1148

表1反映的是在大众信息“Google 搜索”、“百度搜索”中“王仁裕说”远较其他两说占优势，而在以学术信息为主的“中国知网”中，“王仁裕说”远较其他两说占劣势。如果在上面的检索词段前加上“五代”，结果如表2：

检索词段	Google 搜索	百度搜索	中国知网
五代王仁裕《玉堂闲话》	318	411	390
五代范质《玉堂闲话》	216	013	436
五代范资《玉堂闲话》	221	092	462

表2反映的信息是“Google 搜索”和“中国知网”出现了相同的趋势，即“王仁裕说”远较其他两说占劣势，这里不排除 Google 并联结果或相似结果较多的情况，但基本能说明“范质说”、“范资说”今天仍甚嚣尘上，大有淹没“王仁裕说”之势的情形。下表3是表2三个检索词段在“中国知网”中的子项统计结果：

中国知网检索词段中国期刊	全文数据库中国博硕论文	全文数据库	其他
五代王仁裕《玉堂闲话》	100	286	4
五代范质《玉堂闲话》	75	359	2
五代范资《玉堂闲话》	107	352	3